

收稿日期:2023-07-10

# 华中鲁艺:“延安模式”的复制与调适

孙 曙

(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院,江苏 盐城 224005)

**摘要:**1941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历史上简称华中鲁艺)成立。华中鲁艺复制了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办学模式。华中鲁艺的办学实践,是“延安模式”在各根据地文化建设上推行的生动实例。华中鲁艺在办学模式、大众化实践、知识分子改造上都有自己基于“延安鲁艺”而又结合实际的创新,丰富了“延安模式”的文化实践。

**关键词:**“延安模式”;延安鲁艺;华中鲁艺;战时体制;政治性

中图分类号:G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4)03-0061-08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重大项目“苏北根据地‘延安模式’文化建设及新时代传承实践研究”(2021SJZDA011)。

**作者简介:**孙曙(1968—),男,江苏盐城人,盐城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前教育学院一分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大众文化、地方史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4.03.034

1971年,美国学者马克·赛尔登在《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一书中提出“延安道路”概念,这个概念指称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执政实践中的观念与体制,“它首先特别表示在中国西北的黄土地区政治经济条件下,共产主义统治下出现的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他的综合制度”<sup>[1]</sup>,包括“三三制”民主实践、“整风运动”思想运动、“精兵简政”行政改革、新秧歌运动等群众文化建设等。这本著作创新了中国革命研究的新范式,“延安道路”成了理解中国革命和当代中国的重要概念。2002年该书中译本出版,此后“延安道路”一词出现于国内学术界,而在使用中“延安道路”通常被改换成“延安模式”。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延安模式”往往被定义为一种中共主导的发展模式,是新民主主义的具体实施路径,其与梁漱溟“乡村建设运动”、新桂系“三自运动”、民国政府“新生活运动”等,一起推动了抗日救亡中中国的社会发展,奠定了抗战胜利的首要条件,即毛泽东所说的“第一是中国的进步,这是基本的,主要的”<sup>[2]</sup>。在这些模式中,“延安模式”显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优越性,并获得了最终的胜利。

1938年4月,鲁迅艺术学院(1940年改名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文中又称延安鲁艺)在延安开学。鲁艺的办学实践是“延安模式”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体现了“延安模式”文化

教育理念。1941年2月，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在苏北盐城开学。华中鲁艺是苏北根据地复制陕甘宁根据地文教模式而成立。以华中鲁艺为中心，苏北的文化教育特别是文艺活动一时兴盛，盐城也因此被称作“苏北延安”“文化城”。由于处于敌后前线，随时有战斗，华中鲁艺的办学在艰难凶险中坚持着，是年7月，华中鲁艺在第一次日伪对盐阜区的“扫荡”中遭到包围，牺牲巨大，8月，新四军军部改建华中鲁艺为军师两个鲁工团。1942年年底，日伪开始第二次“扫荡”盐阜区，军部精兵简政，鲁工团解散。华中鲁艺的办学实践，清晰地显现了新民主主义时期“延安模式”的文化观念及其背后深层的知识分子观。

### 一、华中鲁艺对“延安模式”的复制

华中鲁艺直属新四军军部，与延安鲁艺并无直接的行政隶属关系，在教学安排、教师配置、教材使用等方面也没有业务关联。延安与盐城远隔千里，又有重重封锁线，这也客观上断绝了两者的联系。但是，从名称上便可知延安鲁艺与华中鲁艺的渊源，有延安鲁艺才有华中鲁艺，其办学理念、培养目标与延安鲁艺一致，在专业设置与学制上更是对延安鲁艺的复制。

1938年2月，在毛泽东等人署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中，即已明确鲁艺的办学目的。文中说：“在这抗战时期中，我们不仅要为了抗日动员与利用一切现有的力量，并且应该去寻求和准备新的力量，这也就是说：我们应注意抗战急需的干部培养问题。‘干部决定一切’！”“艺术——戏剧、音乐、美术、文学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艺术工作者——这是对于目前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因之，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在目前也是不容稍缓的工作。”<sup>[3]</sup><sup>[789]</sup>这几句说明鲁艺办学总的目的是为了抗战，因而鲁艺具体的培养目标也就是培养“抗战的艺术工作干部”。这里的艺术并不是单指艺术，而是“宣传、鼓动与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同时，艺术工作者也不仅是具体的创作个体，而是作为整体的“抗战不可缺少的力量”。此后，《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宣言》再次重申了鲁艺的办学目的与培养目标：“我们宣告艺术学院的成立。……是为了服务于抗战，服务于这艰苦的长期的民族解放战争。”“就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sup>[4]</sup>一年后，经中共中央宣传部讨论拟定、中共中央书记处通过，延安鲁艺确定办学方针：“以马列主义的理论与立场，在中国新文艺运动的历史基础上，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与实际，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团结与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才，使鲁艺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sup>[5]</sup>这个方针由当时主管鲁艺的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部长罗迈（李维汉），于1939年4月延安鲁艺成立一周年之际，在中央大礼堂对鲁艺师生作报告时明确的。这个教育方针比《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更为精确，指明了办学的指导思想（“马列主义”）和历史基础（“中国新文艺运动”），在办学功能上除了培养人才（“训练适合今天抗战需要的大批艺术干部”“培养新时代的艺术人材”），增添了理论研究（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理论）、文艺生产（建设中华民族新时代的文艺实际）、吸纳人才（团结新时代的艺术人才）、建设文化统一战线（团结新时代的艺术人才）这四项，学校的功能从而更为全面。同时明确了办学目标“成为实现中共文艺政策的堡垒与核心”，可见当时党中央对鲁艺的重视，期望鲁艺成为党文化宣传政策与文化工作的征战者与捍卫者。延安鲁艺的创办与发展，是“延安模式”在文化与教育上的探索，其办学目标与教育方针鲜明地体现了文化教育服从于政治的需要，对文化教育的高度重视中包含了对其特殊性的正视。这也体现了“延安模式”政治性与务实性的统一。

1940年12月25日，《江淮日报》（中共中央华中局机关报）刊登了鲁迅艺术学院华中分院的招生启事：“本院第一期招生名额暂定四百名，分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四系，凡中等教育程度以上或有同等学力，年龄在十七到三十岁，身体健康，愿为民族解放服务，对艺术有兴趣者，不分性

别均可报名。”<sup>[6]9</sup> 招生条件明确了华中鲁艺的办学目的是“为民族解放服务”。在华中鲁艺院刊第一期，套红油印了时任华中局书记兼华中鲁艺院长的刘少奇的题词“学习鲁迅，做坚持抗战文艺尖兵”，这个题词也对华中鲁艺的培养目标做了概括，即培养“坚持抗战文艺尖兵”。从办学目的和培养目标，华中鲁艺呈现出与延安鲁艺的一致性。一些回忆文章提到华中鲁艺成立大会上刘少奇、陈毅的讲话，“勉励广大师生努力工作，好好学习，把鲁艺分院办成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艺术堡垒”<sup>[6]10</sup>。“堡垒”一词用于延安鲁艺的办学方针，说明延安鲁艺的“核心”地位。

在管理上，华中鲁艺也参照延安鲁艺。延安的各类学校都按照军事化、半军事化的模式来进行管理。延安鲁艺“各系学生在学习组织上，按系别成立大队，设大队长，并有指导员负责学生的生活、学习和思想工作。大队分若干区队，设区队长，班组设组长，生活军事化，政治气氛浓厚，学习空气紧张”<sup>[7]</sup>。华中鲁艺也采取了军事化的模式，“全院学生编为一个大队，设有大队长、教导员，各系各编为一个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不管男女同学，每个中队都有几颗手榴弹，有几条枪。作息时间都是吹号。无论住在城里或行军野营，日夜都有同学轮班站岗放哨。同学们对于军事生活很热爱，每一个新来的同学，第一桩关心的事，便是赶快有一套新四军的军服，佩上新四军的臂章”<sup>[6]36—37</sup>。华中鲁艺直属新四军军部，又处于战争环境，参照军校式的建制，但不是军校，学习的是文化文艺课程，其组织形式军事化，这在客观上为学生将来投入对敌斗争作了准备。

在专业设置上，华中鲁艺和延安鲁艺一样，设置了文学、戏剧、音乐、美术四个系，第二期华中鲁艺增设一个普通班，这个普通班也是和延安鲁艺第三期设置的普通班一样，是为了“满足前方对开展综合文艺普及工作的‘全才’需要”，而“施以综合性艺术教育”<sup>[8]</sup>。至于学制，延安鲁艺的学制一直处在变化中，前期是半年左右的短期学习，后期（1941年6月起）开始举办三年制的正规教育。华中鲁艺办学时间处于延安鲁艺的前期，据回忆，其学制原计划一年，实际上执行的是六个月的学制，虽然时间长短略有不同，但都是短期训练班的学制。

在教学内容上，由于战时因素和初始办学，延安鲁艺和华中鲁艺课程设置并不稳定，也都没有固定教材，但都强化了政治理论课。延安鲁艺开设了“辩证法”“中国革命问题”“列宁主义”等课程，华中鲁艺开设了“论持久战”“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等课程。在教学组织、教学方法上都注重学生的讨论和艺术实践，延安鲁艺有实验剧团和美术工场等实践平台，有实习晚会、实习展览等实践活动系列；华中鲁艺也有实验剧团和合唱团，还在街市上开设了“大众画廊”。而更重要的是，延安鲁艺和华中鲁艺都强调革命实践：延安鲁艺第一、二期采用“三三三”制短期培训班学制，在校学习三个月，再到前方实习三个月，再返校学习三个月；华中鲁艺也安排了半个月的实习，将师生编成三个中队和一个服务团，到盐城县第五区农村开展民运工作。强烈的革命实践指向，是鲁艺与战争期间我党创办的所有学校的鲜明特征。

在鲁工团解散后，原华中鲁艺的教授贺绿汀、何士德、孟波、莫朴、邵惟等，奔赴延安，执教延安鲁艺。华中鲁艺的教务长黄源和学生杨奚等奔赴新开辟的浙东根据地。这一时期，山东分局与山东纵队于1939年7月创办胶东鲁迅艺术学校（1940年1月停办）。延安鲁艺师生也根据党的指示，先后在晋察冀根据地、晋东南根据地、晋西北根据地创办了华北联大文艺学院、鲁艺晋东南分校（史称前方鲁艺）、鲁艺晋西北分院。鲁迅艺术学院自身也因为时势变化处于合并迁徙中，先后流变为延安大学文艺学院、华北大学文艺学院、鲁艺文工总团、东北大学文艺学院等，办学的不稳定客观上扩大了鲁艺的传播区域和影响力。

延安鲁艺不断被复制，其作为核心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最终，在新中国成立后，延安鲁艺、华中鲁艺、浙东鲁院等的师生汇进新中国的文艺文教等事业中。党指引的“以人民为中心”的鲁艺艺术教育思想，和鲁艺人创造的不怕牺牲、扎根人民、推陈出新、锐意创造的鲁艺精神，赓续不绝，这是“延安模式”在文化教育上的核心内涵，是鲁艺与其所有分校和继承学校最核心的同一

性，是一直流淌在当代中国文化创造中的鲁艺源泉。

## 二、华中鲁艺对“延安模式”的调适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中原局应准备开办两万人学校的指示》，华中局与新四军相继开办了华中鲁艺、抗大分校、卫生学校、盐阜联中等学校，招收了上千的爱国青年，但两万人学校还是没有办成。这个指示，“发展华中”的指导思想与“广泛吸纳青年”的方法是正确的，但具体的数字指标与路径（大规模兴办教育）明显地脱离了华中的实际情况，对华中的敌我形势，党中央的分析过于乐观。华中不是陕甘宁边区这样的后方，而是“日寇侵华的心脏和西侵的后方”，同时“敌寇经常使用着十三个师团的兵力，配合着汪逆的伪中央军十一万和伪地方军十二万，来对付我新四军”，且“‘清乡’与‘扫荡’普遍于整个华中敌后”，再加上国民党反共顽固派韩德勤部等的进攻，华中地区“斗争的残酷性、激烈性、尖锐性是罕见的”<sup>[9]</sup>。以刘少奇为书记的华中局，一方面坚决执行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另一方面结合华中根据地的实际，不僵化不教条，因地制宜，在具体实施上灵活创新。具体到华中鲁艺的办学实践中，也有自己的创新。

### （一）从校团合一到团校合一，创造了灵活的战时艺术教育体制

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工农红军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八路军、新四军的文宣工作也袭用国民革命军的服务团体制，八路军成立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战地服务团，新四军军部成立以朱克靖为团长的战地服务团。服务团充分利用老少咸宜的艺术手段，戏剧、宣传画、标语、小歌舞、演讲等文宣成了动员民众最便捷的媒介。随着形势的变化，这种服务团体制既不能适应战争环境，也不能满足越来越普遍的文宣、民运的需求。综合性文艺人才的需求和吸纳更多青年的需求，催生了根据地艺术学校的诞生，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大部并入延安鲁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丘东平、章枚、邵惟等成为华中鲁艺教师。

由于华中鲁艺是新四军军部最大的文化单位，所以其功能必然是文艺生产与文艺教育的统一体，学校不但培养人才，而且是文艺创作与演出等活动的机构主体，也就是校团合一，艺术生产与艺术生产力的生产并重。一方面，日常教学工作有各种艺术实习、师生实验剧团和合唱队的艺术实践，排演了《扬子江暴风雨》《淮南一家》《重庆廿四小时》等多部大戏，在大众画廊多次举办画展，到街头写墙头诗等。另一方面，学校还直接承担军部与华中局的各种艺术工作任务，许幸之、庄五洲为新四军设计臂章便是一例，其他如承办新兵团成立庆贺演出、盐城第一届农民代表大会祝贺演出、苏北文协成立招待演出等。另外，以华中鲁艺教师为主体成立了各种协会，掀起华中文艺组织建设的高潮。这些协会有苏北戏剧协会、苏北歌咏协会、苏北木刻工作者协会、苏北文化界协会、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苏北分会筹委会等，这些协会作为社会层面的艺术机构与活跃的艺术活动主体，全面推动了苏北根据地的文化活动，苏北小城盐城一时歌咏不断、好戏连台、画展接续，被称为“敌后文化城”。

但是，华中敌后的处境恶劣，北秦庄遭遇战<sup>①</sup>后，刘少奇指示，鲁艺的师生“要作好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目前这样的战争环境，还不宜办大规模的学校”<sup>[10]</sup>。华中局和军部着手改建华中鲁艺，第一届学员毕业后，一部分学员被充实到地方和军队，留下的成立军师（第三师）两个鲁迅艺术工作团，同时调进“抗大五分校、六师十六旅、盐阜区、延安鲁艺及上海等地来的同志”。“新四军鲁工团还担负着为军队、地方培养和输送艺术干部的任务”<sup>[6]47-48</sup>，两个团都下设文学、美术、音

<sup>①</sup> 1941年7月24日，华中鲁艺师生在转移途中遭日伪军包围，丘东平、许晴等二十多位师生牺牲，邵惟等六十多位师生被捕，史称北秦庄惨案或北秦庄遭遇战。

乐、戏剧四个组(后有调整),以团校合一的方式继续培养文艺人才,贺绿汀、蒋天佐、何士德、莫朴、邵惟等教授继续讲授“和声学”“作曲法”“文艺理论与写作”等课程,著名的戏剧家阿英来到苏北,也被请去讲授了“中国戏剧运动史”。同时,鲁工团创作演出了合唱歌曲《一九四二年前奏曲》、话剧《新四军进行曲》《人牛太平》、歌剧《军民进行曲》等。

华中鲁艺团校合一的办学模式是对延安鲁艺的突破。延安鲁艺是文艺生产与文艺教育的统一体,也有附属的实验剧团合唱团美术工场等艺术实践团体,是校团合一,但由于延安鲁艺地处陕北,不在抗日前线,处境相对和平,这样的办学环境决定了其办学机制一直比较正规。而华中鲁艺办学时处于战争状态中,只能选择灵活战时体制,这就是团校合一,鲁工团既是艺术团体,又是学校,还是战斗单位,团员既是师生,又是演职人员、宣传员与战斗员。

无论是校团合一的华中鲁艺阶段,还是团校合一的鲁工团阶段,在复杂危险的战争环境下,都充分发挥了作为文化单位(机构)艺术生产与艺术生产力生产的最大效能,也为我们今天艺术院校与艺术团体的改革发展提供了社会效益最大化的体制模板。

## (二)探索大众化实践,创造本土化

延安鲁艺的秧歌剧、木刻、《黄河大合唱》等都是文艺大众化的典范。华中鲁艺自创办之初,就走着一条群众性的文艺大众化之路。

《新民主主义论》提出,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sup>[11]706</sup>。在刘少奇、陈毅等人与苏北文化界人士的会谈和他们到华中鲁艺的讲话中,一再强调文艺大众化。华中鲁艺主动举起文艺大众化的大旗,“一九四一年初就曾召集苏北文化界人士座谈会,研究文艺通俗化、大众化问题,明确提出坚持文艺为工农劳苦大众服务的方向,走通俗化、大众化的道路是巩固和发展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重要一环,是摆在每个文艺工作者面前的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持续推动墙头诗、黑板报、活报剧等群众性文艺活动的开展。

华中鲁艺推动文艺大众化,更重视本土化。师生深入民间,主动挖掘苏北盐阜地区的传统文化,推陈出新。如“一九四一年初邀请苏北老戏剧工作者在华中鲁艺开会,成立戏剧协会筹委会,五月初召开三百余人的代表会,正式成立苏北戏剧协会”,还“改编和创作了一部分剧本,还举行了京剧、话剧、淮剧等地方剧的大型会演”<sup>[6]16-17</sup>,这些活动推动了旧剧改造,为后来阜宁文工团创造“新淮调”、编演新淮戏打下了基础。

成功利用本土旧形式创新的例子还有“在春节前创作了许多丰富多彩的‘牛印’和‘门神’之类,充实以发展生产和坚持抗战的新内容,拓印后分送给当地农民,深受他们的欢迎”,还发明了新式皮影戏,排演了《阿 Q 正传》《送公粮》等剧目。

与本土文化的结合,走大众化之路,不但使本土文艺有了创造性转换,也使文艺工作者找到了艺术创造的源泉,更使华中鲁艺找到了区别于延安鲁艺的文化标识,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呈现出鲜明的苏北“盐阜味”。

## (三)注重党性原则与一致化,打造知识分子政治性新塑形

延安有鲁艺与“文抗”的矛盾,纠葛多年未解。在延安鲁艺内部也有过萧三与其他人的矛盾,解决的方法是将萧三调离。华中鲁艺也有这样的矛盾,其中最大的风波是“教务长之争”,文学系主任陈岛在原教务长丘东平辞职后,对组织任命的黄源不满,联络各系主任反对。为解决问题,华中局陈毅和彭康亲临学校,召开了主要领导的干部会议,开了一个星期的揭发批评会,陈毅严肃指出“这种宗派性的反领导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为首的要向华中局交代,受骗附和的也要起来揭发和作自我检查”<sup>[12]157</sup>。在华中鲁艺的历史上,一方面,新四军领导人对文化人特别尊重和放

手使用，另一方面，他们在有些问题的处理上特别严厉，比如对陈岛等。丘东平牺牲后，刘少奇在华中党校的一次报告中特别指出“丘东平同志英勇牺牲了，是很可惜的。但是对他在过去鲁艺中的言论，仍要检查一下”<sup>[12][164]</sup>，具体指什么已不清晰，但丘东平的辞职和平常一些情绪化语言应该也是有所指。

当时的知识分子政策，是毛泽东在《大量吸收知识分子》（1939年12月1日）中要求的“共产党必须善于吸收知识分子”<sup>[13]</sup>。此后张闻天主导起草发布的《中央宣传部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关于各抗日根据地文化人与文化人团体的指示》指出，“应该重视文化人，纠正党内一部分同志轻视、厌恶、猜疑文化人的落后心理。须知一个在社会上有相当地位、相当声望、能有一艺之长的文化人，其作品在对内对外上常常有很大的影响”，而“估计到文化人生活习惯上的各种特点，特别对于新来的及非党的文化人，应更多地采取同情、诱导、帮助的方式去影响他们进步，使他们接近大众、接近现实、接近共产党、尊重革命秩序、服从革命纪律”<sup>[3][208—209]</sup>。这个指示对文化人尤显得关爱包容。

为何华中局对文化人出现这样严厉的要求与处理，而且是在整风运动普遍开展之前？究其原因，一是因为战时体制。华中鲁艺处于敌后前线险恶的战争处境中，形势需要一致化，需要严明的纪律，需要减少人事矛盾的干扰。华中鲁艺在北秦庄遭遇战之前，还发生过一次惨案。在一次演出中，由于没有检查做道具的枪，子弹未退膛，舞台上开了真枪，打死了扮演伪军的演员，子弹飞窜出来又打死了导演刘保罗，又在一块青石板上反弹，打伤另一个演员的脚。在追悼会上，刘少奇指出这次不幸是完全不必要的牺牲。丘东平也在与同学的交谈中，指出刘保罗是要负责任的，拿了枪就是军人，怎么能不检查呢？<sup>[14]</sup>从这件事可看出，从刘少奇到丘东平，对在战争环境中强调纪律都是一致的。民族危亡、抗战救国之时，思想上的一致容易达成，而要达成政治上的一致就需要严明的纪律。建立最广泛的高度集中性的强制性的组织，建设全社会高组织化的军事性结构，这是必然形成的战时体制。二是由于华中局领导人刘少奇的主导。刘少奇当时推出了一系列文章，如《共产党员的修养》《论党内斗争》等，强调党内的集中与一致性，致力于塑造从党员到各级党组织的同一政治性的党性。刘少奇在新四军军分会会议上的讲话（1941年6月8日）中指出：“我们新四军是党军，党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工具”，新四军应该“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完全执行党的政策和命令，来完成党的任务，这些东西是最要紧的了，为了提高我们部队的党性，我想这一条非加进去不可。”<sup>[15][850—851]</sup>刘少奇强调了服从党的领导是党性的重要原则，而陈岛和丘东平就是本着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个体性行事，不绝对服从党的领导，违反了“四个服从”。三是新的权力结构形成中的结构力。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之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新领导集体权力进一步确立、巩固与运行，新的军政文教“延安模式”在形成，华中鲁艺的创建也成了新的权力建构的一环，新权力建构中的“向心化”，以政治性的方式，消除了任何非一致的个人性的因素。

所以，华中鲁艺反而是较早地开始了对知识分子政治性的新塑形，整肃个人意志、个人独立性、个人话语，以党性原则与一致化来塑造知识分子的党性人格，锤炼其鲜明的政治性和党性（斗争性、纪律性），规制文化人成为政治人，“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以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sup>[16]</sup>，使最具有个性与话语独立性的文化人、文艺人凝聚到一个思想上，统一到一致行动上，消除多元个体的个体性，形成统一的整体。“绝对服从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成为政治性与党性的核心，也成了新的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的核心。1943年11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下达，“十月十九日解放日报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规定了党对于现阶段中国文艺运动的基本方针。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以便对于文艺的理论与实际问题获得一致的正确的认识，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全党的文艺工作者都应该研究和实行

这个文件的指示,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以便把党的方针贯彻到一切文艺部门中去,使文艺更好地服务于民族与人民的解放事业,并使文艺事业本身得到更好的发展”<sup>[17]632</sup>,此后文艺文化界整风开始。知识分子(文化人、文艺工作者)必须“纠正过去各种错误的认识”,不断“克服过去思想中工作中作品中存在的各种偏向”,作为有缺陷有错误的被矫正者不断进行思想改造。

“延安模式”越来越向高度组织化的一元化一致化发展,形成了“一切为了战争,一切服从战争,在战争中学习,还是为了战争”<sup>[18]</sup>的目标单一化、权力集中化、组织军事化的战时体制(有论者称之为“兵法社会”<sup>[19]</sup>)。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颁布《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和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应当领导一切其他组织,如军队、政府与民众团体。根据地领导的统一与一元化,应当表现在每一个根据地有一个统一的领导一切的党的委员会。”党中央取消了过去的党政军委员会,并规定“中央代表机关及区党委地委的决议、决定或指示,下级党委及同级政府党团,军队军政委员会,军队政治部及民众团体党团及党员,均须无条件地执行”<sup>[20]</sup>。1943年1月,任弼时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进一步阐明了建立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必要性及其基本原则<sup>[17]12—25</sup>。1943年10月,毛泽东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切实执行十大政策》指出:“实行一元化的领导很重要,要建立领导核心,反对‘一国三公’。”<sup>[21]69</sup>党的七大完成了一元化体制巩固定型。这也是落后民族现代化进程的历史选择,凝聚万众成一个思想一个行动一个力量。这个一元化的战时(革命)体制与意识形态才是“延安模式”的根本。与此同时,我党实行减租减息、全民生产、鼓励互助等经济改革,统一战线、“三三制”、差额选举、给妇女选举权等政治改革,文艺大众化、大众教育等文化教育改革,广泛组织农抗会妇救会儿童团等社会改革,这些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方面的改革为一元化体制奠定了经济、文化与组织基础。

华中鲁艺举办时期,正处在这个向一元化发展的节点上,由于身处敌后和华中局领导人的主导,它较早地先发性地在知识分子中进行了一元化塑形。当然,华中鲁艺办学的独特性,也说明了一元化体制下的灵活性,由于战时的隔绝和各根据地情况不同与形势变化,赋予了共产党人更多的创造性。也正是强化党的统一集中领导和核心领导的权威性,又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创造的“延安模式”,才真正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发展道路,最终取得了民族解放,被《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推崇为“杰出的军事和政治风格及他的综合制度”。

习近平总书记说:“对我们共产党人来说,中国革命历史是最好的营养剂。”<sup>[22]</sup>华中鲁艺既是对延安鲁艺的复制,又有别于延安鲁艺,其推动的苏北新文化运动,同样是民族解放运动与落后民族现代化进程中,共产党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延安模式”文化建设的一个鲜活例子,它所凝聚的民族抗争精神和本土化、大众化、效能化的文化实践,也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历史财富。

## 参考文献

- [1] 塞尔登. 革命中的中国:延安道路[M]. 魏晓明, 冯崇义, 译.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4.
-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十五册[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1: 580.
- [3] 毛泽东, 等. 延安文艺丛书·文艺理论卷[M].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7.
- [4] 任文. 永远的鲁艺: 上册[M]. 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前言.
- [5] 钟敬之. 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概貌侧记[J]. 新文学史料, 1982(2): 50—64.

- [6] 朱泽,等.新四军的艺术摇篮,华中鲁艺生活纪实[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2.
- [7] 钟敬之.延安鲁艺:我党创办的一所艺术学校[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8.
- [8] 庞海音.延安鲁艺:我国文艺教育的新范式[M].北京:群众出版社,2018:48.
- [9] 佚名.中国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概况[M].延安:延安新华书店,1944:51.
- [10] 上海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历史研究会三师苏北委员会.苏北抗日根据地纪事[M].上海:华东理工出版社,1998:191.
- [11] 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
- [12] 黄源.黄源回忆录[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 [1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一九四九):第十六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762.
- [14] 林路,邱建生,等.从硝烟中走来[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0:57-58.
- [15] 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新四军·文献(2)[M].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4.
- [16]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一九四九):第十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99.
- [17]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一九四九):第二十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8] 山东省档案局,等.山东革命历史资料档案选编:第四辑[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2:68.
- [19] 朱鸿召.延安兵法社会及文学[J].东方文化,2002(4):104-110.
- [20]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一九四九):第十九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423.
- [21] 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 [22]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2:762.

## The Establishment and Adaptation of Central China Branch of Lu Xun Art Academy

SUN Shu

(School of Preschool Education, Yanche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College, Yancheng, Jiangsu, 224005, China)

**Abstract:** The Central China Branch of the Lu Xun Art Academy was established in February 1941. Its establishment consolidated the new leadership, which is the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of the education mode of the headquarter, in terms of training mode, popularization,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

**Key words:** Yan'an mode; Lu Xun Art Academy in Yan'an; Central China Branch of Lu Xun Art Academy; wartime system; political nature

〔责任编辑:王建霞〕